

苏美关系与战后苏联难民、侨民遣返

张在虎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这直接关系到苏联能否在战争废墟上站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等重大问题。为此,苏联力图乘与美国等盟国的合作尚未破裂之机,迅速将其难民、侨民与战俘全部遣返回国。初期的合作基本上是愉快的,然而随着苏美关系的不断恶化和冷战的全面爆发,美国对苏难民、侨民政策迅即做出重大调整,苏联难民、侨民的遣返处处受阻,大量人员留在了西欧或被重新安置到了美国。

【关键词】苏联难民;侨民;遣返;美苏关系;冷战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5—0148—09

【作者简介】张在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102200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世界战争,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不仅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而且也使更多的人们被迫流亡异国他乡,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其中,为战争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苏联,无疑是遭受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个反法西斯的主要国家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一跃成为声威大震的世界军事政治大国,然而巨大的人口损失却成为它能否在战争废墟上站立起来的重大障碍。正是由于敏锐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在战争胜利在望之际,苏联政府对战后的恢复重建蓝图进行初步规划时,即已考虑到除将军队大量复员外,更重要的是将流落国外的数以千万计的苏联战俘、难民和侨民迅速遣返回国。由于这些人员基本上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区内,苏联要对他们实施遣返,与美国当局的交涉自是无法避免的。换言之,苏联难民、侨民遣返构成了战后初期美苏关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它受到当时苏美关系总体格局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苏美关系的走向。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必将加深我们对战后初期苏美关系演变的特征和实质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数以千万计的欧洲人流离失所,沦为了无家可归的战争难民(Displaced Persons),造成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在这些难民中,俄国人占了最大的份额。据苏联官方宣称,截止1945年12月,包括战俘和平民在内,共有500万流落在欧洲各地的苏联公民被遣返回了苏

对于战后初期苏美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苏联难民、侨民遣返问题的研究,西方学者起步早,成果丰硕。自20世纪50年代始,陆续推出了一些较有分量的论著,如:J. Vemant, *The Refugee in the Post-war World*,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 M. Proudfoot, *European Refugees, 1939 - 1952*, London: Faber & Faber, 1957; N. Bethell, *The Last Secret: Forcible Repatriation to Russia, 1944 - 1947*,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4; Mark Elliot, *Pawns of Yalta: Soviet Refugees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ir Repatriation*,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Michael Robert Marnus,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上述论著或专门,或辟有专章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不过,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遣返本身或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对于苏美双方在此问题上的交涉、决策的全过程则论述不够。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只有李晓岗在《难民政策与美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至于俄罗斯方面的研究,笔者目前尚未见到。

联,而实际上这不过是“真实数字的一小部分”。而另据1949年夏天(此时遣返基本结束)德国美战区的有关官员及记者估计,到战争结束时,在纳粹德国控制下的苏联人大约在800万至1100万之间。

面对这一直接事关战后欧洲社会秩序恢复重建大计的严峻问题,在战争尚未结束时,苏、美、英三国的决策者们就已将解决战争难民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对苏联而言,这一愿望尤为强烈。这不但因为它要以此来弥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而且还出于“维护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的迫切需要。而要达到后一目的,就“使得在戏剧性的抵抗事件足以破坏其国外声誉之前,迅速而又强制性地召回其所有流离失所的国民成为必要”。毕竟,一个具有“无比优越性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允许有为数众多的国民逃难国外、不愿回到祖国怀抱,甚至敌视自己、反对自己的。诚如当时的一位美国国务院难民问题专家所言:由于“每一位来自苏联势力范围的难民都代表着共产主义制度的一个失败”,因此,也必然“构成对该制度基本信念的一个挑战”。苏联解决其国外难民问题的愿望之所以强烈,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克里姆林宫方面也想象到一个庞大的、敌对的(苏联)移民群体在西方的存在,将是对苏联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苏联如不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将这数百万苏联战俘和难民遣返回国,而继续让他们留在西方,将会给自己带来经济、人力、国际威望、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大损失。

有鉴于此,在战争进入到1944年底,打败纳粹德国已是指日可待之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V. M. Molotov)致函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答复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向苏联政府提出的有关双方战俘的看管、遣返等问题时,首次表达了苏联政府对苏联难民、侨民遣返问题的基本态度:苏联政府不仅要将被遣返回国,而且那些被拘押的苏联国民、被德国强行驱逐出苏联国境的苏联公民,以及已经恢复自由被送到美国去的苏联公民,也将同样被遣返回国。

苏联的这一态度当即在美国高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和激烈的争论。因为接受苏联的这一立场,势必意味着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力措施配合苏方将大量不愿返回的苏联人遣返回国,这显然与美国一直以来所信奉和鼓吹的自由、人道的价值观念及政治避难自由等原则严重相悖,因而遭到了美国政界人士的猛烈反对。1945年2月7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C. Grew)在给正在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电报中,即集中表达了国内政界人士的这种情绪。他指出,同苏联签订的战俘和平民交换协定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对于那些被俘时着德军服装并且要求享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苏联公民,应该给予其此种保护。对于那些已身处美国且不是战俘的苏联公民,应在美国传统的避难政策基础上予以处理”,“虽然为美军所解放,但已不在美军事当局看管下的人员;虽然为苏联政府声称为苏联公民,但在大战爆发前并非为苏联公民,且他们自己也否认自己是苏联公民的人员。这两类人员在正式协定达成前应予以慎重考虑。”

然而,由于此时对德战争尚未结束,战后的欧洲重建尚未谋划。更为重要者,为了减少彻底战胜日本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军方的决策者们正在为使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与其进行着紧张而艰难地谈判。后者无疑在当时的美国对外战略考量中占据着优先的地位。

J. Vemant, *The Refugees in the Post - War World*, p. 84.

George Fischer, "The New Soviet Emigration," *Russian Review*, vol. 8, no. 1. (Jan., 1949), p. 6. 不过,据美国学者马克·艾略特考证,这一数字约在“5315709至5826445人之间。参见Mark Elli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ced Repatriation of Soviet Citizens, 1944 - 47,"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2. (Jun., 1973), p. 255。

Mark Elliott, *Pawns of Yalta: Soviet Refugees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ir Repatriation*, p. 135, p. 247.

Anthony T. Bouscar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since 1945*,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pp. 15 - 1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FRUS), *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55, p. 414.

FRUS, *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697.

所有这些因素就使得美国当局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均将维持最大限度的合作作为其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尽量满足苏联提出的要求。在苏联的战俘、难民及侨民遣返问题上,面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不断施压,美国当局在权衡利弊后,决定采用较为策略的方式接受苏联的立场。2月9日,斯退丁纽斯复电格鲁,指出:对于苏联与英国方面已经达成协议的遣返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完全赞成”;“我们在此一致认为,把与日内瓦公约保护及现在美国的苏联公民相关的问题,纳入到以解决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境内解放战俘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协议中去,将是不明智的”;而对于那些着德军服装但为苏联官方宣称其为苏联公民而“索要的人”,我们会将其送交苏联当局,因为“尽管有遭到德国人报复的危险,但我们认为如果不在此问题上迅速达成协议,那么(苏联方面)对我方战俘的释放也将会严重拖延”。

在经过苏美双方一系列紧张的交涉和美国内部的一番激烈争论与反复论证后,1945年2月11日,苏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签署了关于双方战俘、难民及侨民遣返的协定,即《关于苏联和美国指挥下的军队解放战俘和平民的协定》(Agreement Relating to Prisoners of War and Civilians by Forces Operating under Soviet Command and Forces Operating und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mmand)。协定规定:“所有被美国指挥下的军队解放的苏联公民和所有被苏联指挥下的军队解放的美国公民,在他们被解放后,将毫不拖延地把他们与敌方战俘分离开来,并将他们安置在单独的营地或集中地予以照料,直到他们被移交给苏联或美国当局为止。如果情况允许,则将他们移送到双方商定的地点”,双方的“遣返代表将有权进入其公民所在的营地或集中地”,双方将“尽最大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各战区不时的军事行动、供应及运输条件下,保证该协定上述各条款的实行”。

该协定的基调是苏美双方的紧密合作,可是其措辞却无法掩盖双方的明显分歧:苏联要求遣返的是“所有的苏联公民”,然而对于其具体所指,协定却并未“未确定”。这一文字上的模糊表述,实际上体现了双方的妥协:苏方可以藉此满足自己对“全部遣返”的要求,美方亦可以以其并未对苏联公民的范围做出明确界定从而保持自己在实施中的相对自由。也正因如此,该问题日益成为双方在遣返过程中摩擦不断直至走向全面对抗的焦点。

苏联需要的是美国将其解放区内的苏联公民甚至前俄国侨民均无条件地全部强制遣返回苏联,对于那些拒绝遣返者,则要求将他们视作“通敌卖国者,纳粹的帮凶或卖国贼”,“作为战犯引渡回其法定国家”。而美国则从维护自己所信奉的人道主义原则、避难自由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要对苏联所要求的遣返予以保留。双方在遣返问题伊始就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就美国而言,出于“保护落在苏联手中的美英战俘的需要,对可能由此引起苏联政府怀疑,从而使其破坏他们为赢得战争所做的努力的担心,对于西方吸纳和重新安置如此大规模的苏联公民所涉及的困难的忧虑”,对于苏联难民“迫切渴望返回”心情的过高估计,以及认定与苏联的战时同盟是战后“太平盛世前兆”因而必须维护这一同盟的设想,最终迫使其暂时放弃了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因素,而转取实用主义的与苏合作的立场,严格遵循协定的精神,为此不惜采取非人道的强硬手段——“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满足苏联所要求的难民和侨民遣返。

在此背景下,一场前所未有的苏联难民、侨民大遣返行动在欧洲大地上迅速展开,并在5月至9

FRUS, 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 757, pp. 985 - 987.

FRUS, 1945, vol 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60, p. 796.

Eugene M. Kulischer, “Displaced Persons in the Modern World,”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62, Reappraising Our Immigration Policy, (Mar, 1949), p. 170.

N. Bethell, *The Last Secret: Forcible Repatriation to Russia, 1944 - 1947*, p. 204.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ostwar Policy*, p. 642; John Hildring, “Position on Resettlement of Displaced Person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XV I, (Jun 15, 1947), p. 1163. 转引自 Mark Elli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ced Repatriation of Soviet Citizens, 1944 - 1947,” p. 257.

Mark Elli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ced Repatriation of Soviet Citizens, 1944 - 1947,” p. 268.

月间进入高潮。由于双方在遣返中合作的密切,以致这一时期被一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官员称为“东西方合作的相对蜜月”。结果在 1945年 9月以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共向苏联方面交付了 2034000人,至少占从西方国家占领区遣返的所有俄国人的 89%。

如前所述,由于在协定中美国方面已为自己预留了在遣返问题上的相当自由权,因而在遣返过程中虽然双方在总体上保持了高度的合作,但在对待来自立陶宛等二战爆发后并入苏联又未被美国承认的国家的公民,以及着德军服装且要求日内瓦公约保护的苏联公民时,双方并未实现真正的合作。对于前者,美国政府一直坚持“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以及家在 1939年边界线或寇松线以东的波兰人,如果他们不坚定地声明其苏联公民身份,不应将其遣返回苏联。”因为“除德国人以外,促进未包含在雅尔塔协定内的其他战争难民的非自愿遣返,是违背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当发现美方的这种不合作状况后,苏联方面立即做出反应,希望美国等西方各国将“所有来自波罗的海共和国和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苏联公民移交给苏联军事遣返当局。”苏联的抗议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美国依然坚持上述政策,即仅将“定居在 1939年苏联疆界内的所有苏联公民移交给苏联当局”,而对那些试图寻求日内瓦公约保护的苏联公民,由于当时对德战争尚在进行,出于如强行将这类苏联公民遣返必然引起德国方面对其拘押的美军战俘进行报复的担心,美国方面一度顶住苏联方面的压力,拒绝了苏联方面的要求。这是遣返初期双方密切合作中又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二

9月份后,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告战争彻底结束,苏美双方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在落实战时确定的战后世界安排时,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在诸多领域、众多问题上针锋相对,关系逐渐恶化。与此同时,苏战区的美国战俘也于 12月以前基本上安全返回。据宣称,截止 1947年 1月,“已没有任何一个盟国的难民或战俘还留在苏联及苏联所控制的国家内”。此外,战争刚结束时的庞大难民潮对西方盟国资源的巨大压力,也随着难民的大部遣返而大大减缓。这些束缚美国严格履行雅尔塔协定的压制因素已经基本消失,而在遣返过程中因强制遣返、武力遣返所引发的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又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军事当局本就存在的对强制遣返的反人道的憎恶。1945年 8月 27日,美德国事务政治顾问墨菲(Robert D. Murphy)致电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指出:鉴于武力遣返酿成的严重流血事件造成苏联难民和美国军警人员重大伤亡的严峻现实,驻欧美军和盟国管制德国委员会美国代表团正在讨论对拒绝遣返的苏联公民是否继续使用武力的问题。直接从事苏联难民及侨民遣返的美军高级官员,甚至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本人,都开始将使用武力视为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艾森豪威尔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很快就发现……(对雅尔塔协定)严厉而苛刻的应用将常常违背我们所信奉的人道主义信念。”在此背景下,美国当局便开始在继续维持苏美合作的框架内逐渐修改此前的苏联难民、侨民遣返政策。

1945年 9月 4日,艾森豪威尔以驻欧美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对美国正在实

Mark Elliot, *Pawns of Yalta: Soviet Refugees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ir Repatriation*, p. 82.

FRUS, 1945, vol I, p. 799, p. 801.

FRUS, 1945, vol II, p. 1165.

FRUS, 1945, vol V,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67, p. 1104.

Eugene M. Kulischer, "Displaced Persons in the Modern World," p. 268.

Michael Robert Marrus,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316 - 317.

FRUS, 1945, vol V, p. 1104.

Mark Elliot, *Pawns of Yalta: Soviet Refugees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ir Repatriation*, p. 102.

行的苏联公民遣返政策进行了回顾后,郑重请求对该问题进行全面检讨,并对今后在遣返苏联战俘和平民时是否继续使用武力予以明确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随即将此问题提交国务院—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予以考虑,商讨对策。该委员会在经过长达3个月的调查论证后,于12月21日正式将美国的苏联难民、侨民遣返政策做出重大修改,并迅速下达给欧洲各战区予以实施。

修改后的苏联难民、侨民遣返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协助而不是强制遣返国外的苏联国民”。新政策从美国的利益及依然需要维持的苏美合作的诉求出发,将“必要时使用武力”的适用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制:1939年9月1日前苏联国境内的苏联公民,且是着德国军服的战俘,或者是在1941年6月22日或以后未经苏联允许擅离苏联国境的苏联军人,又或者是被苏联指控为自愿为敌人提供帮助和服务的人,而且苏方的这种指控必须能够让美国军事当局满意的合理依据。除此三类人员外,对于其他为1939年9月1日前苏联国境内苏联公民的人员,则将尽一切努力促进其遣返,但不必强制施行“非自愿遣返”。对于此类人员,可以允许苏联当局自由地接近他们,劝说他们自愿返回。同时,美国方面也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步骤,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遣返有组织的抵抗,并将继续有力地阻止任何形式的旨在诱使这些人员反对遣返的宣传。此外,新政策还规定,对于不在上述范围且被苏联声称苏联公民的人员,在不使用武力、威胁和强迫的情形下,可以慎重考虑让苏联官员接近他们,劝说其返回家园。而对于所有在1939年9月1日以来有权成为苏联国民的人员,如果他们坚定地要求这一权利,并且表示愿意被交给苏联当局,美国方面应继续促进其移交。

需要一提的是,对于那些在“二战”爆发前离开俄国的老流亡者(Old émigrés),即所谓的俄侨(美国等西方国家认定其为难民),美国一开始就将其排除在强制遣返之外。尽管苏联政府对这些人未作强制遣返的要求,但原则上还是希望其返回。为此,苏联政府也设计了种种宽大而诱人的政策以吸引他们回国。而这些人也的确受到了苏美合作大潮的影响以及苏联此类政策的触动,陆续加入苏联国籍,有些甚至随从遣返大军返回了苏联。然而随着苏美关系的逐渐恶化及美国对苏联难民、侨民政策的调整,很多人又纷纷退出苏联国籍,放弃了返回苏联的选择而继续留在了西方。

不难看出,美国对苏联难民、侨民遣返政策的调整,其核心在于最大限度地奉行符合其人道主义价值观念的自愿遣返方针,如此就将那些对苏联制度不满、向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苏联平民排除在了遣返行列之外,这显然是与战后美国意欲领导世界的利益需要相吻合。同时对那些曾经站在纳粹德国方面同苏军作战——实际上也就是在同整个盟军作战——的原苏联军人,则继续按苏联的意愿予以强制遣返,而这也同样符合美国惩办战犯的利益需要。因此,新的环境的到来,新的利益的需要,促使美国政府对其遣返政策进行了重大修改,使其得以部分地回到了人道主义的轨道上来。而这显然是有违苏联全部强制遣返宗旨的。

对此,苏联立即实施了针锋相对的反击。1946年2月,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谴责,认为他们是在有组织地努力“毒化这些不幸的人的灵魂和思想以阻挠他们的自然意愿和返回祖国的强烈愿望。”驻德苏军总司令朱可夫元帅也代表苏联军方对此做出了严厉谴责,指出此时“美国和英国正在向苏联公民和战俘灌输反动思想使他们背叛……在这个过程中,谎言、对苏联的诽谤及胁迫正大行其道”,所有这一切,红军将领都将之归结为一场“肮脏的反苏战役”。

除了进行公开的谴责之外,苏联政府还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击行动。一是展开舆论攻势。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苏联将严厉处理遣返者的说法,苏联均将之贴上“神话故事”、“难以置信的谎言”和“胡说”的标签,予以严厉驳斥。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大造舆论,广泛宣传对

FRUS, 1945, vol. V, p. 1106, pp. 1108 - 1109.

Michael Robert Marrus,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324, p. 317.

Georgii I Zhukov, *The Memoirs of Marshal Zhukov*, New York: Delacorte, 1971, p. 666.

Mark Elliot, *Pawns of Yalta: Soviet Refugees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ir Repatriation*, p. 152, p. 82.

于难民、侨民回国后的优厚待遇,如对于同纳粹德国合作的人员将宽恕其罪孽,对于苏联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流亡西方的难民或侨民,将恢复其苏联国籍,并且在他们回国后将许诺给予丰厚的物质待遇,等等;二是苏联遣返官员不顾美国军政当局的阻挠,径直深入难民营,直接接近难民,强行遣返,实际上是在“绑架难民”。

由于美国政策的转向,以及广大拒绝遣返者的顽强抵制,尽管苏联方面进行了种种努力,这部分“硬核”的遣返还是失败了。到1949年3月最后一个苏联遣返小组离开西方为止,大约近50万符合苏联强制遣返要求的俄国人——包括前俄侨——成功地“逃脱了雅尔塔协定之网”,按照其意愿留在了西方,成为了所谓的“不回归者”。而在此期间遣返回苏联的仅为1836人。

三

1946年后,美苏关系日益恶化,美国政府深感有对以苏联难民为中心的整个难民政策进行根本调整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直以来,美国实行严格限制难民入境的政策。因为大量难民的涌入,无疑会大大增加美国社会的负担,夺去美国公民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移民法的排外条款剥夺了那些“将很可能是公众负担的人”进入美国的权利。这一条款在20世纪30、40年代被广泛应用,以阻止当时为数众多的国际难民尤其是欧洲难民进入美国。在以孤立主义为主要外交取向的年代里,美国对于困扰欧洲的一战以来的难民潮基本上奉行了虚表同情但相对超然的立场和政策。

然而,“二战”后美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及其对外战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战”后的美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制世界霸主。随着其实力的膨胀,美国在“一战”结束后曾遭受重挫的领导世界的雄心再度发酵。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不但需要向世界展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向全世界表明我们是自由卫士”,而且还需要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为此就必须展开一场同苏联争夺人心的斗争,起到既打击苏联形象又可将反苏的难民“都改造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或者实际上的自由战士”以为我所用的双重功效。鉴于此,美国的决策者们不无担忧地认识到,在当时“西欧被美国视为反对苏联势力扩张的生死攸关的防波堤”的前提下,“西欧大量无国籍人员的存在,不管他们是否因战争或其后果而被迫离开祖国,都将直接危及相关国家的经济稳定”。而面对这一严峻局面,遭受战争沉重打击的西欧国家对于消化数十万苏联的“不回归者”却又无能为力,美国必须积极地承担起这一责任来。

随着苏联东欧难民主体遣返的基本完成以及相伴而至的美苏关系的日趋恶化和冷战的爆发,美国难民政策中的“所谓人道主义就与实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打上了深深的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烙印,成为其“同苏俄继续进行权力斗争时所运用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成为其对苏冷战的软武器,成为其“反对黑暗势力——共产主义暴政势力——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

Michael Robert Marrus,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317.

当然,这仅是主要原因,此外还包括难民自身的努力及采取隐瞒苏联公民身份等各种手段、西方遣返人员的暗中帮助,以及遣返机构的疏忽等原因(参见 Michael Robert Marrus,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317; Mark Elliot, *Pawns of Yalta: Soviet Refugees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ir Repatriation*, p. 125.)。关于他们隐瞒身份的情况还可见 George Fischer, "The New Soviet Emigration," pp. 6 - 19.

Mark Elliot, *Pawns of Yalta: Soviet Refugees and America's Role in Their Repatriation*, p. 82.

Gil Loescher and John Scanlan, *Calculated Kindness: Refugees and America's Half - Open Door,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6, p. 224, p. xvii

R. Divine,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924 - 1952*,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117.

R. Divine,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924 - 1952*, pp. 142 - 143.

Gil Loescher and John Scanlan, *Calculated Kindness: Refugees and America's Half - Open Door, 1945 to the present*, p. 2.

R. Divine,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924 - 1952*, p. 145, p. 133.

在此背景下,美国自进入 1946年以来就开始积极参与到解决强制遣返后剩余的欧洲难民及逃离苏东国家的新难民问题的各项事务中去。为了使这些问题的解决能有效地贯彻其上述战略意图,纳入到自己的战略轨道上来,美国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积极倡导和推动成立了由美国领导的、以重新安置不回归者为主要职能的国际难民组织。由于该组织的成立所蕴含的深刻反苏动机和背景,在其成立过程中,苏联东欧国家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了尖锐的对立。西方国家试图将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及反共分子包含进来,而苏东国家则试图将那些他们所认为的不共戴天的政治敌人排除在外。苏联东欧国家坚持所有“战争期间和战后出现的难民均须遣返,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国际援助应该仅限于一个用途——即遣返那些自由地选择回国的人”;西方国家则坚持“真正的难民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国际援助同样应该用于对难民的救助、再安置及为他们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护”。苏联东欧国家认为重新安置仅适用于那些“被宣布为无国籍的人员”;西方国家则认为任何难民“在处于完全自由状态和对包括来自其出身国政府的适当信息在内的有关事实有了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当最终并明确地表示反对回到其出身国后,不应再被强迫他们回到其出身国”,这些人均应置于重新安置之列。

最终,为了避免使这一组织陷入难产,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在做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指导其活动的《国际难民组织章程》(Constitu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按照该章程的规定,国际难民组织的职能就是对符合其关怀条件的人员予以“遣返;确认身份,登记和分类;照料和救助;法律和政策的保护;运输;在能够和愿意接受他们的国家里帮助定居和重新安置”。由此可见,国际难民组织对于广大剩余难民的处置,除将继续进行遣返外,又将帮助他们在异国定居和重新安置作为一项新的基本对策提了出来。虽然当时的确仍有大量无政治背景的欧洲难民可以按照其意愿遣返回其本国,但问题在于此时尚未被遣返的难民中绝大多数却是拒绝遣返回国的苏联东欧难民了。显然,章程之所以仍将遣返置于国际难民组织的首要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个安抚和让步。

但实际上,这一让步不过是停留在表面上而已。因为对于需要遣返的难民,章程又特别规定了所谓“合理反对”的限制条款,即对“那些证明他们拥有对迫害恐惧的合理理由,或者证明他们是被强迫的家庭或者有健康原因的人,将不会违背他们的意愿对其进行遣返”,此类难民只能由国际难民组织予以异国安置。如此,广大拒绝遣返回国的苏联东欧难民就可以在该组织的保护下合法地享有遣返豁免权,而这才是美国赋予这一组织的最主要职能。

由于美国“一贯反对将战争难民强迫遣返回苏联,是国际难民组织预备委员会的最主要促成者”,并实际上“控制着这个新组织的运转”,使之成为贯彻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难民政策的“工具”,因此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看来,它实际上“间接地使西方国家担负起了保护自己的移民敌人的义务”,并且“企图通过把所谓的难民再安置到世界上的那些国家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劳动力”,亦

Patrick Murphy Malin, "The Refugee: A Problem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 no. 3, (Sep., 1947), p. 36.

M. J. Proudfoot, *European Refugees, 1939 - 1952*, pp. 399 - 401.

"Constitu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 as Approv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December 15, 194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 no. 3 (Sep., 1947), p. 578; M. J. Proudfoot, *European Refugees, 1939 - 1952*, p. 402.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 vol. 23, New York: Americana Corporation, 1980, p. 335. 详见 "Constitu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 as Approv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December 15, 1946, p. 579.

FRUS, 1948, vol. IV,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House, 1974, p. 402.

Michael Robert Marrus,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343; M. J. Proudfoot, *European Refugees, 1939 - 1952*, p. 401.

James C. Hathaway, "The Evolution of Refugee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Law, 1920 - 1950,"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33, no. 2 (Apr., 1984), p. 281.

M. J. Proudfoot, *European Refugees, 1939 - 1952*, p. 401.

即它“不是给难民和无家可归者提供物质援助并帮助他们返回他们的国家,而是尽一切可能阻止原本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难民和无家可归者返回家园”,因而该组织实际上“被帝国主义国家用作”与其“真正意图毫不一致的目的的工具”。所以,从一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就对该组织予以激烈反对,并最终拒绝加入该组织以示抗议。

美国贯彻其新的对苏难民、侨民遣返战略的第二条战线,是对其移民法作了重大修改,分别于1948年6月和1950年6月通过了两个难民法案,公开允许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进入美国,从而最终放弃了它长期坚持的阻止难民进入美国的传统政策。

《1948年难民法》(Displaced Persons Act of 1948)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意义重大的难民立法,它产生于美苏冷战逐步走向高潮的6月份,是美国政府为迎合这一形势需要而实施的一个重要外交步骤。它规定的难民准入条件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政府此举“并非是在简单地关心‘二战’难民,而实际上是在日益关心那些不愿返回的‘二战’难民,或者那些正在逃离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东欧难民”。

经过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美国一方面将大量不愿返回家园的苏东国家难民,重新安置到了含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其中包括南森难民(Nansen Refugee)即前俄国侨民2万名(来自中国的数千名俄侨也在内),苏联难民4.1万名。由于很多苏联难民为逃避遣返而隐瞒了其身份,因而实际上绝不止此数;另一方面于1945—1950年间接收了近40多万名欧洲难民,而其中来自苏、东国家的比例高达90%。详见下表:

1948年难民法案与1950年难民法案所批准人数的比较

类别	1948年法案	1950年法案
国际难民组织战争难民	200000	301500
来自中国的欧洲难民	—	4000
无家可归的欧洲孤儿	3000	5000
最近的难民	2000	500
身份调整者(临时在美国的战争难民)	15000	15000
……	……	……
总计	247377	415744

——略改于国会记录表(1950年6月6日), p. 8198

资料来源: R. Divine,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924 - 1952*, p. 141.

其中涉及到的大量俄国侨民,他们本来“受胜利大潮和盟国合作的影响”,响应苏联政府的号召恢复了苏联国籍而加入了等待遣返的苏联公民大军,然而当国际形势“随着‘冷战’的爆发再度发生重大变动后”,“他们中有许多人便后悔了其决定”,后悔的结果便是退出苏联国籍。这种情况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a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vol. 3. New York: Macmillan inc., 1976 (Moscow,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p. 209.

Richard Ferree Smith, "Refuge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67, The New Immigration (Sep., 1966), p. 116.

J. Vemant, *The Refugee in the Post-War World*, pp. 56 - 85.

另据劳伊斯契尔和斯堪兰的研究显示,从1945年到1950年进入美国的难民为35万人(参见 Gil Loescher and John Scanlan, *Calculated Kindness: Refugees and America's Half-Open Door, 1945 to the present*, p. 2).

George Ginsburg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roblem of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1917 - 1956,"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1, no. 2 (Apr., 1957), p. 86.

George Ginsburg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roblem of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1917 - 1956", p. 87.

在欧洲乃至中国的俄侨中普遍存在着。

这些退出苏联国籍的俄侨,多数留在了西欧、美洲诸国,真正直接去往美国的并不多。虽然他们也想去美国,美国也正在努力接纳俄国及苏联难民入境,但因为美国的“俄国侨居地非但不大而且也不繁荣。因此,尽管它尽其所能,但仍然无法为如此多的不幸同胞提供应有的工作和住房。另一个困难是,直到现在,一般的本地美国人还是不能理解这些在苏联专制政权下遭受如此之多苦难的俄国战争难民都是反共产主义者。一个美国农民说,‘哦,我不想要俄国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少的俄国人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的原因”。

就白俄难民和苏联难民比较而言,美国更倾向于苏联难民,尽管他们都同样符合其对苏冷战的需要,但相对于没有在苏联制度下生活过的白俄难民,那些在苏联制度下生活了多年的苏联难民价值要大得多。

总之,苏联难民及侨民的遣返问题构成了战后初期苏美关系中一个相对特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反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走向。当战争尚未结束、双方的合作基础依然存在时,双方在此问题上保持了相对密切的合作,从而保证了绝大多数苏联难民和侨民的遣返。但随着双方基本关系的日趋恶化和冷战的全面爆发,美国对苏联难民及侨民的遣返政策也日趋强硬,其基本趋势是由尽力配合苏联的遣返行动转到逐渐抵制直至鼓励苏东国家难民拒绝遣返的政策上来,将美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关怀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及意识形态因素混杂于一处。其结果是在冷战业已全面爆发并日益激烈的年代里,双方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剑拔弩张。面对美国的对抗,苏联尽管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但收效甚微,大量拒绝遣返的苏联难民和侨民按照美国的意图留在了西方世界。

(责任编辑:徐涛)

参见 George Ginsburg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roblem of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1917 - 1956," p. 87; J. Vemant, *The Refugee in the Post-war World*, p. 56; Elizabeth W. Cope, "Displaced Europeans in Shanghai," *Far Eastern Survey*, vol. 17, no. 23 (Dec. 8, 1948), p. 276; . . . , 1920 - 1940 - . . . : 2003 . . . 84.

Alexandra Tolstoy, "The Russian DPs," *Russian Review*, vol. 9, no. 1, (Jan., 1950), p. 56.

records in Tacitus' Annal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illuminate that, as for the death of Germanicus and trial of Piso, which once made a great impact in Rome, Tacitus uncovered a public narrative which opposed to the official rhetoric and was the very one the latter tried to conceal. The using of and focalizing on rumours in the Annals represents the critical intent of Tacitus' historical writing.

Russia - U.S. Relation and Repatriation of Russian Refugees and Emigrants **ZHANG Zai hu**

Russia suffered great population loss in WW II, and therefore it attempted to have all its refugees and emigrants sent back to the country before its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 and other allies. At firs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went on well in the repatriation work. However,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ussian - U.S. relationship and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the repatriation met obstruction, forcing a large number of Russian refugees and emigrants to resettle in Western Europe or the U.S.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reat Britain and U.S. on Controlling Exports to Socialist Countries (1961 - 1963) **LIU Ziku**

There were both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Western League on controlling exports to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east. The U.S. adhered to strict export control, while the Great Britain was opposed to it as it wa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It was not until 1962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ppeared. The mutual effects among different policies of state departments of America determined this result.

California Schoo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Mid-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18th Century **DU Xun cheng, LI Ji**

Historical comparisons made by scholars of the "California School"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18th century are based their critiques against the "western-centric" view at that time. Despite their method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new insights, scholars of this school left behind a lot of unresolved issues. This paper aims to questi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California School". We argue that the "California School" scholars hold onto a fundament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overemphasizes on "Productivity", which consequently led to their underestimation of the fact that advancements i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actually greatly determine how one economy transforms and develops. Their efforts in abandoning some general regularities and standards of historical progression when making historical comparisons are also questionable. They also made some flawed attempt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Commentary Review on the Prison History Researches of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Recent 3 Decades **CHEN Zhao si**

For a long time,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rison are both disparaged by the scholars of Law and History. Until 1980s, a series of works on the traditional prison were published, the barren situation of this study had been changed. Even so, in the case of the Qing prison, the study is still unsatisfied. This paper intend to car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n the Qing prison, through reviewing the related papers, the law history, the prison history,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concerns on this subject and also provide a little help for the scholars with interest in it.

(葛鉴瑶 译)